

CS 主编 / 孙宏开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艾努语研究】

赵相如
阿西木 / 著

民族
出版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艾努语研究】

赵相如 阿西木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艾努语研究 / 赵相如, 阿西木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2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 孙宏开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1364 - 4

I. ①艾… II. ①赵…②阿… III. ①突厥语—研究
IV. ①H21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5121 号

艾努语研究

策划编辑: 欧光明

责任编辑: 千 日

封面设计: 晓玉工作室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 - 64228001 (编辑室)

010 - 64211734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1.75

定 价: 5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1364 - 4 / H · 772 (汉 23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政策，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就组织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现了不少新的语言。五六十年代的语言调查成果，曾作为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写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列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于1980年~1987年正式出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促进了民族语文事业新的繁荣和发展，也为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机遇。在此期间，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深入边疆、山区、海岛，又陆续发现了一批鲜为人知的语言。这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往往不为人们注意，但它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尤其是一些使用人口越来越少的语言，急需抓紧时间调查，以保存这些可贵的语言材料。为此，我们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机构的支持下，对这些语言逐个进行了系统、深入、全面的调查，已经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并决定以“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

我们认为，新发现语言的系统调查、深入研究与及时刊布，对于进一步了解国情；对于发展语言科学，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繁荣各民族文化；对于深入研究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编辑、出版本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远东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 **编审委员会**

1996 年 1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编审委员会

主 编：孙宏开

副主编：徐世璇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良

王 均

王辅世

毛宗武

孙宏开

陈宗振

欧阳觉亚

胡增益

徐世璇

梁 敏

黄 行

照那斯图

戴庆厦

目 录

导 论	1
一、新疆艾努人的分布及其语言调查研究	1
二、新疆阿布达尔人的族属及其源流	7
三、阿布达尔人究竟从哪里来?	12
四、关于“阿布达尔”这一部落名称的来源 及其族源问题	13
五、新疆艾努语的主要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15
六、词汇方面的特点	20
语 音	22
一、元 音	22
(一) 元音的分类	22
(二) 元音的描述与举例	23
二、辅 音	26
(一) 辅 音	26
(二) 辅音的描述与举例	27
(三) 复辅音	31
三、语音的结合	34
(一) 音节结构	34
(二) 划分音节的原则	34

四、重 音	35
语 法	37
一、词 类	37
(一) 名词	37
(二) 形容词	52
(三) 数词	58
(四) 量词	65
(五) 代词	74
(六) 副词	83
(七) 动词	87
(八) 连词	133
(九) 助词	137
(十) 后置词	139
二、句 法	141
(一) 按句法关系分类	141
(二) 按语法功能和结构关系分类	143
三、句 子	151
(一) 句子成分	151
(二) 句子分类	162
词 汇	170
一、艾努语构词法	170
(一) 单纯词	170
(二) 派生词	171
(三) 合成词	173
二、借 词	175
(一) 阿拉伯语借词	176

(二) 维吾尔语借词	177
(三) 汉语借词	178
三、关于艾努语性质的讨论	181
(一) 关于艾努语词汇问题	183
(二) 关于艾努语的性质问题	189
与亲属语言的比较	195
词汇附录	218
一、艾努语、维吾尔语、达里语词汇对照表	218
二、艾努语、维吾尔语相同词汇比较	277
三、艾努语、维吾尔语复合词范例	289
四、艾努语与达里语相同或相近词汇比较	293
五、艾努语、维吾尔语、乌孜别克语、哈萨克语和 柯尔克孜语的词汇比较	301
六、艾努语话语材料	311
(一) 日常用语和话语材料	311
(二) 一个艾努老人的自诉	356
(三) 几个特殊语词的注解	358
主要参考文献	360
后 记	364

导 论

一、新疆艾努人的分布及其语言调查研究

新疆古称“西域”，作为地理名称，始见于西汉。主要指我国新疆地区，也包括现今中亚、西亚和东北非洲。

位于我国西北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古就是一个文化区，是中西文化荟萃之地。新疆地域辽阔，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还有独特的文化资源和丰富的语言资源。新疆境内民族众多，语言各异，多元文化并存与交融，相互渗透和影响，是各种文化互动与交往的一座开发不尽的语言文化“宝藏”。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维吾尔语资源大国。维吾尔语不仅是维吾尔族群众的主要交流工具，而且也是新疆境内的许多兄弟民族通用的民族语言之一。因此，维吾尔语对新疆境内各民族的语言及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在新疆天山南麓地区初次调查发现，自称“艾努人”（ejnu）或“阿布达尔人”（AbdAl）的这一稀有群体，他们对外讲维吾尔语，但在其群体之间相互交流或在家庭内部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是一种外人所不懂的独特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在新疆这座语言文化“宝藏”中发掘出来的一个新的语种。该语种是受维吾尔语长期影响而产生语言质变的

一种混合语。

据最新资料统计，独立使用这种混合语的艾努人或阿布达尔人，目前已遍布于天山南北的和田、洛浦、于阗、墨玉、策勒、民丰、且末、阿克陶、阿克苏、库车、叶城、疏勒、英吉沙、麦盖提、莎车、岳普湖、伽师、巴楚、博乐、米泉、伊宁、乌鲁木齐等县市的城乡地区^①，总人口约 12000 人左右，在全疆都能找到这一群体游离的足迹。又因操这一语言的人称，他们的祖先是早年从波斯迁徙到新疆的“阿布达尔人”的后裔，所以中国与古代波斯的“阿布达尔人”的族属及其语言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再一次彰显出中国与伊朗的历史渊源。

世代繁衍生息在我国新疆天山南麓的“艾努人”，亦称“阿布达尔人”，尽管生活在人口稠密的广大维吾尔族居民的层层包围之中，并与维吾尔族毗邻相处，但是他们却一向是聚群而居、自成一片、自建村落，近似于我国回族“大杂居，小聚集”的地域居住特征。这一稀有群体，除所操语言的独特性外，还具有各个驻地的对外封闭性，遵守“女不嫁外男，儿不娶外女”的祖风，所有男性都有过游历四海“乞讨”的奇异生活，宗教上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苏菲神秘主义”。因此，他们居住的村落，犹如一个个语言“孤岛”或一块块封闭的“飞地”。人们对这一稀有群体的了解至今仍是一个谜团。因此，对艾努人即阿布达尔人的研究涉及文化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和社会语言学等综合性学科。

1976 年夏，本书作者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派遣，前往新疆和田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在中共和田地委和地区教育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得到艾努人的充分信任和通力配合下，

^①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新疆民族语言分布状况与发展趋势》，326 页，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

于当年7月至9月，利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对原属和田县烽火人民公社的“格窝孜村”（giwoz），现改属和田市肖尔巴克乡合尼村的艾努人及其语言等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搜集了丰富的语言和人文等资料，圆满地完成了调查任务。在调查期间，由于我国唐山地区遭遇特大的地震灾害，严重地波及北京地区；又因当年夏季玉龙喀什河水泛滥，导致交通阻断等客观原因，未能到南疆各地艾努人聚居的村落进行调查。于是，我们不得不改变计划，把对其他地方的调查时间，集中在“格窝孜村”的调查。原和田县的格窝孜自然村，是南疆一带艾努人聚居的一个较大的村落，人口约1200余人。该村从支部书记到生产队长，都由艾努人担任。他们与南疆地区的洛浦、于阗、墨玉、疏勒、英吉沙、莎车等地的艾努人之间，一直保持着通婚的姻亲关系和频繁密切的交往及经济等方面的联系。

根据我们从格窝孜村搜集到的有关艾努人的人文材料，特别是对其语言广泛、深入的调查来看，对新疆其他地方艾努人及其语言情况可以得出一个大体轮廓。并且为正确识别和推究南疆地区艾努人居民的来源及其语言的源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科学依据。

值得提及的是，我们在“格窝孜”村的调查结束之前，为了复核调查材料和继续倾听艾努人的故事，在征得和田县委和原大队党组织的同意后，我们从“格窝孜”村的艾努人中又选择了四个发音合作人，把他们集中到和田地委宾馆（供给食宿，给予报酬），利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对所调查的材料逐一进行核对及修正。这四名发音人是：

白地·艾买提（bedi ɛmet），40岁，原任格窝孜村村党支部书记。

阿不都维力·图尔逊（abduweli tursun），45岁，原格窝孜村贫农社员。

吾布力艾山·赫司买提 (obul hesen hysmet), 27 岁, 原格窝孜村小学语文教师。

巴拉特·热杰普 (barat redjep), 65 岁, 原格窝孜村贫农社员。

总之, 我们对艾努人及其语言的调查获得的资料, 是从实际调查中得来的, 是经受得住时间和历史检验的。

关于艾努人这一群体内部使用的这种语言, 在我们之前, 国内一直没有人调查研究过, 也从未见到国内有关这类语言的著述问世。本书作者于 1980 年 8 月提供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二次科学讨论会的《艾努人及其语言》的学术论文, 受到了与会学者的瞩目, 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在《民族语文》(1981 年第 2 期) 刊布这一混合语言的发现的论文, 从语言学领域开启了我国研究混合语的先河, 得到了国际、国内学术界的赞赏与好评, 从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极大兴趣, 纷纷前往该地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

在我们之后, 前往新疆调查艾努人语言的有奥地利科学院的拉德斯特特 (O. Ladstatter) 和提特孜 (A. Tietze), 他们分别于 1983 年和 1986 年两次前往喀什地区、和田地区调查阿布达尔人的村落, 并出版了《新疆阿布达尔 (艾努) 人》一书 (德文版)。

1997 年夏, 日本京师大文学部言语学研究室的林彻 (Tooru Hayasi), 协同新疆的沙比特·肉孜 (Sabit Rozi)、塔伊尔江·穆罕默德 (Tahirjan Muhammad) 和王建新, 前往喀什噶尔地区疏勒县等地进行了有关“艾努语”的调查, 并发表了《新疆喀什噶尔地区谢依赫勒村村民使用词汇》的报告。

此外, 新疆学术界相继前往调查的还有穆塔里甫·斯迪克、阿布莱提·阿巴斯、艾力·吾甫尔和谷苞等人。其中穆塔里甫·斯迪克于 1988 年发表了《谢依赫人与帕奇依麻扎》的论文 (维

吾尔文版)；阿布莱提·阿巴斯于1987年发表了《谢依赫人的族源问题》的论文(维吾尔文版)；艾力·吾甫尔2008年发表了《天山南部的阿布达里聚落研究》等历史方面的论文。

还应该提及的是，在我们之前，我国阿布达尔人这一群体，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瞩目。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相继派格纳德(F. Grenard)、伯希和(P. Pelliot)、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coq)、赫丁·卡尔洛(Hildon Kaarlo)、拉肯特(G. Raquette)、斯坦因(Aurel Stein)等人来我国进行大规模的探险考察，并发表了与该群体有关的论著。

综观国内外学术界对艾努人即阿布达尔人的语言及其族属的研究情况，假说甚多，矛盾丛生，莫衷一是。尤其是国外学者到新疆调查时，他们既不懂当地的语言(维吾尔语)，又不懂艾努语，仅仅依靠翻译进行调查，这难免会带有局限性和不科学性。比如，关于用什么名字称呼这个语言的问题，不是很容易决定的。至今还没有见到一个准确而科学的论著。

语言与社会具有相互依存共变的关系。通过研究，我们之所以不把这一群体使用的语言定名为“阿布达尔语”，而是根据艾努人的自称定名为“艾努语”，其主要原因是，艾努语中有许多区别于印欧语言的独特性质。它与原本阿布达尔人使用的阿布达尔语不但有着量的变化，而且发生了质的区别。新疆的阿布达尔人由于脱离共同的印欧语比较早，且长期与维吾尔语亲密接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两种语言相互融合、兼容并蓄，渐次产生语言上的质变，从而形成浑然一体的一种混合语。它既不是阿布达尔语，也不是维吾尔语，近而具有了合成语言的典型象征。

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和特殊的社会现象，它反映人们在发展中所依存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及其发展的影响。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和它所依存的社会环境相隔离，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阿布达尔人在新疆定居以后，这使他们与原来所依存的

社会环境和讲阿布达尔语的基本群众隔绝了。同时也和原来所相联系的伊朗语族语言的传统中断了。特别是因为他们生活聚居在人口众多的南疆，处于讲维吾尔语的广大居民的层层包围之中，使阿布达尔人散居于维吾尔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作为一个移民群体，首先感到“水土不服”的是语言。由于阿布达尔人原使用的语言对外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历史的条件和现实的需要迫使阿布达尔人势必要学习和使用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维吾尔语已逐渐变成阿布达尔人与维吾尔族相互交流的共同语言。而且原来使用的阿布达尔语仅保留在阿布达尔人之间或家庭范围内部相互交流使用。他们在与维吾尔语的频繁交往和长期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最集中的表现在语言的融合上。这必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双重语言制阶段，最后维吾尔语取得了优势，使得他们的语言逐步丧失其原有的特征，并且不得不逐渐由屈折语类型结构的伊朗语族的波斯语转移到黏着语类型的突厥语结构上来。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深层接触的结果，也是阿布达尔人在转入定居的新疆——所谓先进的“回鹘文明”的处女地上，播下了东西文化交融的种子，得到了发育成长。在新疆地区，这种混合语或合成文化的产生是艾努人或阿布达尔人移居该地而产生的必然现象，并伴有明显的东西文明融合或合成文化的不可避免之趋势。

因此，我们对艾努人内部独立思维，行使交际功能的这一独立母语，既不能说它是行语，也不能说它是方言，更不能说它是外来语。艾努人内部使用的这一独立语言，比它使用同义的维吾尔语更带有浓郁丰富的群体感情，反映出他们对自己原有语言的亲近感。双重语言制的存在，充分说明艾努语尚未被维吾尔语所完全同化，这也是它目前尚能保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如美国已故的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说：“严格地说，我们事先就知道不可能树立起有限的几个类型，就把世界上几千种

语言和方言的特点都照顾到。就像人类的一切制度一样，语言也是花样万千，变幻多端的东西，难以妥当地贴上标签。哪怕类型的尺度分得再细致，还几乎一定会有许多语言必须经过一番修剪才能放进表格里去。”他又指出：“语言的历史研究已经无疑地证明，语言不但是逐渐地改变，也是一贯地改变着的；它不自觉地从一种类型变向另一种类型，在世界相隔很远的地区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① 我国艾努语的形成及其类型结构的变化，充分证明这位语言学大师的正确论断。我们对新疆地区的艾努语的发现和研究，作为混合语的亮点，对其深入进行探索，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现有的语言学理论，甚至对过去的有关语言的谱系分类法的定论，有所修正或补充。

二、新疆阿布达尔人的族属及其源流

伊朗（古称波斯）是西亚的大国，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南北文化交往的通道。中国和伊朗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和传统友谊。中国和伊朗都是古老文明的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开始了友好交往。据史书记载，西汉时，张骞“凿空”而开拓的通往西域之路，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这条商业大动脉不仅沟通了人类文化核心区的汉王朝、贵霜帝国、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而且也把罗马的景教、印度的佛教、波斯的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又称“祆教”或“拜火教”）、犹太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相继通过波斯或经由阿富汗（从伊朗独立建国前）传

^① [美] 爱德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语言论》，108～1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入我国西北地区和内地。^① 中国的丝绸、织锦、瓦器、植桑、养蚕、缫丝、种茶和印刷术等技艺也陆续传入伊朗或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内线，即从我国新疆通过帕米尔高原进入阿富汗，经过拉巴特、赫拉特等城市到达古代波斯和欧洲等地。

关于新疆的艾努人（或称阿布达尔人）及其语言问题的研究，不论是从民族（部落）、语言、文化、宗教，还是从历史等方面，都与古代伊朗或阿富汗民族独立建国以前，移入我国新疆的阿布达尔人的历史息息相关。

关于新疆的“艾努人”（亦称“阿布达尔人” *abdāl*）的来源问题，我们先从他们的“自称”和“他称”的含义谈起。

关于“艾努”这一自称含有“乞食者”，“流浪者”或“贫苦者”等意。自称的这些含义充分反映了艾努人安于贫困，超脱尘世，甘愿过游方四海的“乞讨”生活的特点。无怪乎当地群众称我们原调查的“格窝孜村”（今改称“哈尼村”）地方为和田远近闻名的“讨饭村”。至今，在艾努语中把官吏、敌人和狗都用一个词“*gurg*”（波斯语，“狼”、“贪婪的人”之意）来代表。在艾努人看来，官吏、敌人、狗是“三位一体的”，都像贪婪无厌的恶狼一样，剥削、欺凌、压榨世界众生。

“他称”——新疆当地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直用“阿布达尔”来称呼艾努人。阿布达尔一词，来自阿拉伯语。它所代表的含义有：①人种部落的名称；②割礼者；③圣者、圣仙或管理地面的圣仙；④隐士；⑤流浪者或乞食者。^②

从他称和自称中可以看出，两者的含义是相吻合的。据“格窝孜村”的艾努人说，艾努人在道及自己的来源时，只所以

① 参见张敏：《阿富汗文化和社会》，71页，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

② 参见包尔汉编的《维汉俄典》中“*abdāl*”词条的释义和张谦译著的《波华辞典》中“*abdāl*”词条。